

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城镇劳动供给的影响

丁仁船

【摘要】 为了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的深层原因,本文综合利用各人口、制度、宏观经济等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向量自回归等模型,从同期和滞后两个方面来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制度变革、失业率上升、劳动力供给增加是中国劳动参与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宏观经济因素 劳动供给 同期影响 滞后影响

【作者】 丁仁船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副教授。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障碍得到初步消除,国民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良好时期,就业量稳步增长。同时由于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中国城镇劳动力增长超过就业增长,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结果出现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失业问题反而越发严重的现象,城镇劳动参与率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学者们对这一现象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姚先国、谭岚(2005)通过对城调队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丈夫收入的上升解释了1995~2002年间所有家庭中妻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12.87%;郭继强(2005)通过对上海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在低工资水平下确实存在向右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即低收入农民工随工资率的上升劳动供给反而下降。这些研究成果从微观层面部分解释了中国劳动参与率所经历的长期下降现象。

在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参与率影响方面,蔡、王美艳(2004)认为,参与率的下降是缘于社会失业率持续升高,一方面使那些长期面临再就业困难的失业者丧失信心,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可能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劳动者放弃或推迟了就业。当然不同属性的人对这些因素的反应是不同的,宏观因素是作用于微观因素而发生影响的。金剑(2004)利用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呈正相关,与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和失业率成反相关。林原、林玳玳(2007)分析了特定岗位变动对特定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得出服务业岗位每增加1%,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0.62%的结论。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动幅度很大,对家庭、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相关的研究却很少,尤其是宏观层面的。目前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虽然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有的在理论上是无法解释,有的在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是方法模型中遗漏的变量太多,非经济因素大都被忽略。人口是劳动供给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人口是经济的外生变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劳动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此人口是模型中不可或缺的变量;其次,劳动参与率变动与经济的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本期的因变量与前期

的自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同期上这种关联可能不显著。忽视滞后影响使得这些实证研究结论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究竟宏观方面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作用方向如何?哪个是主要因素?目前的研究还没有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答案。因此,本文拟采用更多的变量,将人口因素、制度因素、失业因素等纳入模型,在方法上将社会统计方法与经济计量方法有机结合,就同期和滞后两种时间序列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做出解释,并就这一下降过程的必然性进行判断。

二、研究方法

经济因素对城镇劳动供给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市场工资率、家庭非工资收入、家庭其他成员工资收入等通过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影响到个人心中的保留工资水平,最终影响个人是否劳动参与、是否接受工作的具体决策。宏观方面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物价水平、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速度)等因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影响劳动供给:首先是影响厂方的劳动需求,例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波动及通货膨胀等都对宏观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劳动需求影响就业机会并进一步影响到预期工作收入和工作搜寻成本,最终影响到工作决策。其次是通过影响微观的家庭经济因素而影响劳动供给意愿。

由于影响就业的宏观经济因素很多,研究之前剔除某些变量可能会导致信息损失,全部保留又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然后将因子得分作为新的变量分别与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向量自回归、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分析,以期能发现各变量在同期和滞后期的影响及影响的时间跨度。

(一) 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是将众多的互相有关的变量转换为几个相互独立的因子变量,模型表达式为:

$$\begin{cases} x_1 = \alpha_{11} F_1 + \alpha_{12} F_2 + \dots + \alpha_{1m} F_m + \epsilon_1 \\ x_2 = \alpha_{21} F_1 + \alpha_{22} F_2 + \dots + \alpha_{2m} F_m + \epsilon_2 \\ \dots \\ x_p = \alpha_{p1} F_1 + \alpha_{p2} F_2 + \dots + \alpha_{pm} F_m + \epsilon_p \end{cases} \quad (1)$$

x_1, x_2, \dots 为原变量,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F_1, F_2, \dots 为独立的因子, α 为系数。将原先 p 个互相有关的自变量转为 m 个因子, m 最大等于 p ,实际个数的确定一般以因子的特征值是否大于 1 为标准,或者以各因子所能解释原变量的方差比例来确定,当 $m = p$ 时,因子解释了原变量的所有方差,但变量个数没有减少。通过方程计算出每年各因子 F_1, F_2, \dots 的值,作为新的变量代入回归方程。

(二) Granger 因果检验模型

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里,有些变量是单方向影响,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有些变量间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Granger 因果检验可以识别二者究竟是单向影响还是双向影响。检验的思路是:如果 y 影响 x ,或者 y 是 x 的原因,此时 y 的变化必然先于 x 的变化,可以通过 y 预测 x ,如果根据 y 的过去值对 x 进行回归时,再加上 x 的过去值,能显著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就界定为 y 是 x 的格兰杰原因。具体方法是先就 y 和 x 的过去值对 x 进行回归:

$$x_t = c_1 + a_1 x_{t-1} + a_2 x_{t-2} + \dots + a_p x_{t-p} + \beta_1 y_{t-1} + \beta_2 y_{t-2} + \dots + \beta_p y_{t-p} + u_t \quad (2)$$

式(2)中变量的下标为时期标识, $\beta_0, \beta_1, \dots, \beta_p$ 为系数, 由此得出无限制残差平方和 RSS_0 ; 然后就 x 的过去值对 x 进行回归:

$$x_t = \beta_0 + \beta_1 x_{t-1} + \beta_2 x_{t-2} + \dots + \beta_p x_{t-p} + e_t \quad (3)$$

由式(3)得出有限制残差平方和 RSS_1 , 再将两次获得的残差平方和建立统计量进行 F 检验。

$$\frac{(RSS_0 - RSS_1) / P}{RSS_1 / (T - 2P - 1)} \sim F(p, T - 2P - 1) \quad (4)$$

式(4)中 T 为样本容量, P 为最大滞后阶数。如果通过检验说明 y 是 x 的格兰杰原因。

在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中, 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参与率高导致失业率高,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失业率高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 二者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很难说得清, 格兰杰因果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依据。

(三) 向量自回归模型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分析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 主要适合于平稳的时间序列, 可以反映变量的滞后影响及影响的时间长度。设 y_t 为 $(n \times 1)$ 向量, 即包含几个相互影响的变量, 如果回归的滞后阶为 p , 则模型记为 $VAR(p)$, 模型表达式为:

$$y_t = c + \beta_1 y_{t-1} + \beta_2 y_{t-2} + \dots + \beta_p y_{t-p} + e_t \quad (5)$$

为 $(n \times n)$ 系数矩阵。 $VAR(p)$ 系统中, 每一个变量对常数项和它的 p 阶滞后项, 以及 $VAR(p)$ 中的其他变量的 p 阶滞后值进行回归。每个回归中, 其解释变量相同。

三、实证分析

为了具体分析影响失业率、参与率的各种经济因素, 本文多角度选取因变量, 共有 20 个, 初步分为五类: 一是经济水平变量, 包括人均 GDP、投资率、工资水平。二是经济结构变量, 包括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制度变迁变量, 包括工业产值中非公比例、财政收入占 GDP 比例、资本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利用外资比例、所有制结构、物价水平, 主要反应中国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四是劳动力供给变量, 包括城镇人口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高校在校生人数增长率。五是就业需求变量, 包括就业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以上变量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经过初步处理化为比例或比率。计算劳动参与率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来自各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部分年份为内插值, 就业总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失业人数是根据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流动人口失业数、下岗人员失业数、大中专毕业生失业数计算获得。

(一) 因子分析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 采用主成分提取因子的方法, 通过方差最大旋转得到特征根大于 1 的 4 个因子, 共解释原 20 个变量总方差的 86.16%。4 个因子分别归为经济发展因子、经济制度因子、劳动力供给因子和经济活力因子。部分变量并没有按预期归入相应因子, 经济水平变

资本市场化程度是以投资来源中来自自筹、贷款和其他的占总投资资本的比重来表示; 利用外资比例是以总投资中外资所占比重表示; 外贸依存度是以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 物价水平以通货膨胀率表示。

具体方法和过程参见丁仁船、王大D:《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究竟有多高》,《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6期。

表1 各变量的因子归类

经济发展因子	经济制度因子	劳动力供给因子	经济活力因子
GDP	资本市场化程度	城镇人口增长率	投资增长率
工资增长率	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
投资率	利用外资比例	高校在校生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工业产值非公比例	外贸依存度		
所有制结构	物价水平		
第二产业产值比例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	第三产业产值比例		

量与经济结构变量无法分开,合并为一个经济发展因子,具体如表1所示。

通过因子得分我们可以直观看出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就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趋势(见图)。

1. 经济发展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除1989~1991年3年萧条外,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结构不断好转,尤其是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发展因子得分几乎成直线上升。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快速增长到2005年的13985元,年平均增长8.76%。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劳动收入也相应增加,年工资水平相应从615元增长到18405元,实际工资年增长6.74%。同时随着改革的推进,非农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投资率从18.45%上升到48.60%。改革之初,全国经济成分严重单一,公有制单位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94.61%,此后由于外资企业不断涌入及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份额逐年下降,2005年时公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只占投资总额的46.67%(国家统计局,1979~2006)。经济水平和工资的上升,在个人就业上存在着收入效应,边际工资的效用降低,工人有减少劳动的倾向。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就业形式也发生显著的改变,公有制单位职工不断减少,从事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越来越多,很多从业者从正规就业走向非正规就业。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化还使得不同成分经济间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公有制企业将冗余的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加深,隐性失业显性化。

2. 经济制度因子

经济制度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市场开放和自由程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反映宏观经济中国的计划成分,资本市场化系数反映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实际利用外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反映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有意思的是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归入经济制度因素,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从业比重却归入经济发展因子,说明第二产业

就业与第三产业产值更多的是与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中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很高但就业比重不高,第二产业就业偏差最大,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这种结果缘于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第二产业人均技术装备水平高,就业刚性非常大。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日益增强,企业逐步重视按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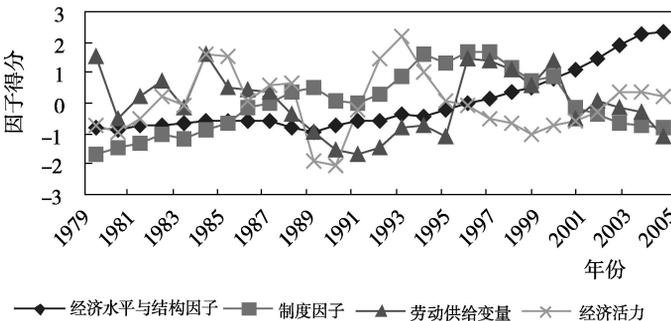


图 1979~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因子得分

配置要素,第二产业就业开始快速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但体制外增加的就业远远超过国有企业下岗人数。第三产业则呈现出相反的现象,低层次的服务业就业比较多,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因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更有意义,更多的反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如贸易、物流、金融、计算机软件服务等。从现实来看,这两个变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从制度得分来看,中国的制度变革可以分为4个阶段:(1)1979~1988年,中国的经济制度得分一直上升,外资比重逐步攀升,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降,市场化程度加深,改革所产生的效应非常明显。(2)1989~1992年,制度得分呈现下滑,在这期间中国也确实加强了宏观调控,加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治理,防止投资过热。(3)1992~1996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始效应显现,制度得分快速上升。(4)1996年至今,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及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到1996年时,外资比重开始下降,财政收入比重开始上升,近年来制度得分逐步趋于稳定。

3. 劳动供给因子

劳动力就业状况受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共同制约,如果供给大于需求越多,就业竞争越发激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失业和劳动参与状况。1978~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7.92%上升到42.99%。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60%,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从11593.81万增长到42214.20万,年均增长4.90%;城镇人口就业从9514万增长到27331万,年增长3.99%。各时期城镇人口增长与就业增长几乎是同步的,也都出现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高增长,1978~1995年,城镇每年增加1000万人~1200万人左右。1996年以来,人口绝对数增长速度加快,每年净增2000万人左右,每年新增就业在800万人左右(国家统计局,1979~2006)。进入21世纪,就业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由于就业基数已经很大,每年就业增加的绝对量依然较大。

4. 经济活力因子

劳动力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投资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就业弹性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快,劳动力需求越多。在人均技术装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增长越快,劳动力需求也越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07%,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变缓,进入21世纪增速又缓慢回升。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投资增长更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达19.85%(国家统计局,1979~2006),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需求量的上升。

(二) 多元回归及向量自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一)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模型二),将内生变量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连同外生变量一道纳入模型。通过分析将经济发展因子和经济活力因子作为内生变量。经济制度变量虽然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关系,但目前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政策的调整。劳动力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增长状况,由于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完全取决于十几年前的出生人口,因此将经济制度因子和劳动力供给因子作为外生变量。笔者还试图将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转变作为二分变量带入模型,但无法通过检验,可能是与经济制度因子重叠,因此将其从模型中剔除。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各模型的拟合优度都很高,解释力强,调整后的 R^2 都在0.93以上。就劳动参与率来看,经济制度因子的影响非常明显,在0.01水平显著,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与劳动参与率负相关;劳动力供给对参与率的影响在多元回归中没能通过检验,但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在0.1水平显著,并且作用方向为负。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参与率负相关,回归系数最大,在0.05水平

表 2 劳动参与率就各因素的回归结果

参数与自变量	劳动参与率(因变量)			失业率(因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R	0.98		0.96	0.99	
AdjR ²	0.95		0.93	0.97	
F	64.57		30.65	188	
SIG	0.000		0.000	0.000	
常量	0.777 ***		42.662 *	0.042	
经济发展因子	-0.032 **	-0.739 **		0.003	0.09
经济发展因子(-1)			1.179		
经济发展因子(-2)			-4.170		
经济制度因子	-0.019 ***	-0.472 ***	-0.001	-0.002	-0.07
经济制度因子(-1)					
经济制度因子(-2)					
劳动力供给因子	-0.005	-0.134	-0.472 *	0.02 **	0.10
经济活力因子	0.006 ***	0.165 ***		-0.02 *	-0.08
经济活力因子(-1)			0.265		
经济活力因子(-2)			0.183		
劳动参与率				-0.4	-0.06
劳动参与率(-1)			0.821 ***		
劳动参与率(-2)			-0.387		
失业率	0.157	0.107			
失业率(-1)			-0.632	0.768 ***	0.79
失业率(-2)			-0.836 **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滞后期。***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表示在 0.1 水平显著。

显著,说明经济水平的提升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最主要因素。经济活力的上升显然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并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各因子回归系数的符号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只是在模型一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但没能通过检验。模型二中,除了经济发展因子滞后 1 期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外,其他都一致,而滞后 2 期系数符号为负,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其绝对值也远远大于滞后 1 期的系数,因而滞后

效应总的来说依然是负的。失业率的滞后 1 期系数虽然没有通过检验,但为负值,滞后 2 期的系数也是负值,并通过检验,说明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在同期上可能表现为提高劳动参与率,滞后的影响是降低劳动参与率。就失业率来看,显著影响的因素有:(1)劳动力供给。供给的增加显著提升失业率,回归系数在 0.05 水平显著。(2)经济活力。经济的迅速成长有利于降低失业率。(3)前期的失业率。前期失业率越高,现期的失业率也越高,回归系数在 0.01 水平显著,并且回归系数最大,作用最为明显。为了确定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的这种滞后的影响,笔者还进一步做了格兰杰因果检验,试图使这一结论更加可信,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变 量	F 统计值	P 值
失业率不是劳动参与率的格兰杰原因	8.98889	0.00272
劳动参与率不是失业率的格兰杰原因	1.72465	0.21175

失业率不是劳动参与率的格兰杰原因,在 0.01 水平上被拒绝,说明前期过高的失业率确实会降低后期的劳动参与率。然而劳动参与率不是失业率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意味着劳动参

与率的下降并不能降低失业率。为了反映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时间跨度,笔者又做了脉冲响应,发现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会持续到滞后4期,当失业率突然变动1%时,劳动参与率变动0.05%。表面看来影响的幅度不大,但考虑到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的绝对量,实际影响还是很大的。例如,失业率从4%上升至8%,那么劳动参与率下降约3.8个百分点。在转轨时期,中国真实的失业率上升幅度已超过100%(丁仁船、王大D,2007),因此可以认为失业率升高是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四、结论与讨论

(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劳动参与率下降最重要的因素,这不仅印证前面的假设,也与国际发展规律相一致,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成倒U型曲线。家庭消费效用是家庭产品、市场产品和闲暇的函数,收入提高使得家庭获得市场产品日益广泛,这不仅降低市场产品的边际效用,而且相对提升了闲暇和家庭产品的边际效用。家庭为了获得最大效用从而增加对家庭产品和闲暇的消费,减少劳动供给。这个决策的前提就是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维持家庭总体物质生活水平不出现大的下降,经济水平的提高为其提供了可能。也既是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是受经济水平制约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家庭内部分工。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摆脱解决温饱和个人最小生活支付阶段,进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享受更多闲暇的小康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看重生活质量,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闲暇的需求越来越多。计划经济时期,低下的工资水平加上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家庭收入几乎与就业人数成正比例关系,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但如果家庭中一人退出市场意味着总收入将巨幅下降,因而存在很高的劳动参与率。

(二) 经济制度变迁降低了劳动参与率

经济制度对就业的影响程度紧跟经济发展因子,处于第二位。中国城镇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推进的,首先在外资企业中实行,在总结成功经验后才开始在国有企业中实行。也即是原有企业、单位制度基本稳定,对新开办企业实行新的改革办法,因而外资比例、外贸依存度、非公投资比例等可以反映改革的具体进程。经济制度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计划经济成分下降意味着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弱化,市场体制的确立使得劳动力就业的行政配置功能进一步消失,政企分开及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使得企业冗员的制度根源得到消除,隐性失业显性化,安置就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企业办社会的局面得到扭转,个人就业成本显著增加。(2)外资的大量进入加快了市场化进程,收入渠道逐步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并存使得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富裕家庭内部分工走向深入。(3)产业结构调整 and 体制间就业转换过程中,原有职工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岗位,不得不退出市场。(4)实行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个人必须完成必要的劳动量才能获得相应报酬,避免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出工不出力的机会主义,加大了劳动者的体能消耗,偏好闲暇者退出市场,按劳分配制度促进了家庭内部分工。(5)由于中国采取普遍的日工作8小时制度,工资主要是采用月薪的形式,劳动时间弹性很小,劳动力要么全部投入、要么完全退出市场劳动中,家庭在比较各个成员的生产率后,做出部分成员完全参与市场劳动、部分成员完全从事家庭劳动的决策,由此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

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采用小时工资制,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劳动时间长短,家庭时间和市场时间冲突相对较少,一个人可以同时从事市场劳动和家庭劳动,因而在经济水平上升

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的现象。而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自然回落。改革开放之前,政府不顾企业经营成本盲目安置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企业用工的理性增强,用工量按员工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率的比较结果来确定。作为劳动供给单位的家庭,根据家庭成员影子价格及机会成本做出决策。这样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个人、家庭,决策的理性化程度都得到提高。

(三) 城镇非劳动参与人口增长迅速促使劳动参与率下降

劳动参与率随城镇人口增长而下降,缘于城镇非劳动参与人口增长快于劳动参与人口。除1980年前后中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量返城外,城镇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城镇就业来拉动的。1991年前,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是城镇新增人口的58.12%。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城市功能发生显著的变化,居住和教育功能逐渐得到强化。中国中、高等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城镇。1998年以来高等教育扩招,使得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成为城镇中增长最快的群体。

另外,城镇外延扩大导致征地农民数量也在迅速增长,这些失地农民在身份实现转变后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却是比较低的。同时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大批农村人口具备一定财力后便向城市积聚,尤其是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离、退休者。这三部分人口快速增长使得非劳动人口增长加快。1991年后新增就业人口占新增城镇人口的比例下降为39.55%。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城市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城镇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四) 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引致就业效应期较长

中国城镇就业规模迅速壮大,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拉动的结果。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城镇原有的非劳动参与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吸纳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入城打工,潜在的使得参与率上升。然而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本的深化,中国的就业弹性逐渐减小,单位资本对就业的拉动力减弱。因此就业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增长速度。

分析表明,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效应持续1年左右,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效应期约4年左右。说明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使用行政手段,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就业很快形成拉力。市场经济时期,这种就业的拉动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完成。这也符合中国实际,在经济繁荣之时,企业往往追加资本投资,而后续追加工人约持续5年左右。笔者对江苏省昆山市第一次经济普查原始数据所做的统计基本证实以上的论点。

(五) 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比较复杂,劳动参与率与同期的失业率关系不显著,但失业的滞后影响为降低劳动参与率

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失业对劳动参与的同期影响是补偿效应和沮丧效应同时存在,因而使得影响结果不显著,但滞后的影响是沮丧效应为主,表现为劳动力退出。在同期上失业与劳动参与并没有出现我们预期的负相关,而呈现出一种模糊关系的主要原因是:(1)在失业率突然升高就业变得困难时,很多失业者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发布要滞后很长一段时间,比如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失业信息,至少滞后半年以上。个人在求职前获得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是前期的,本人的心理预期仍然是以那时的状况为依据,个人在求职过程中逐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而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而个人的参与状况无法对失业率做

出灵敏的反应。(2)在求职过程中,当求职者发现失业严重、就业困难,因而选择退出使得参与率下降。(3)当家庭部分人口失业时,家庭收入下降,继续过着以往美好生活的心理预期与实际生活状况对比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甚至破坏了整个家庭计划。

为了使现实生活再次回到以往正常的轨迹上,部分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或就业,从而使得劳动参与率上升。三种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使得同期参与率与失业率没有表现出特定的关系,而在长期上,前期的高失业率恶化了个人心理预期,个人更多选择不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六) 过高的失业率缘自劳动力过多供给及失业人员的滚存,与劳动参与率高低变动无关

目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劳动力供给充足。另外,随着农民工的迁入和大量失地的农民进入城镇寻找非农就业岗位,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岗位需求,失业人数逐年增加。高失业率一方面使城镇工资长期不变或增长过缓,部分人口自愿失业。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减少增加了工作搜寻的时间和物质成本,搜寻时间延长又进一步促使失业率上升。当社会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以后的就业存在滞后影响。

由于前期没有解决就业的失业人口并非全部选择退出市场,部分失业人口一直要累积到下一期,这批人将在未来和新成长的劳动力争抢工作岗位,说明失业不仅存在自强化现象,而且确实存在“回滞”现象。劳动参与率对失业率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因此并不能把失业率升高归因为劳动参与率过高,真正的影响是失业率影响劳动参与率,而不是相反。同时也说明,降低劳动参与率不能降低失业率,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来降低失业率反而会引致更多的劳动力供给。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渠道多元化所引起家庭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对于这部分下降,无需过分担忧,可以看成是原先过高劳动参与率的自然回落。还有部分是因为劳动供给大于需求使得就业机会紧张而导致的沮丧退出,这不是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被动退出往往集中于弱势群体,会使得弱势家庭更弱,需要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失业率上升最根本的原因是城镇人口增长过快,宏观劳动力供给过多。影响失业率的是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而不是城镇人口的劳动供给水平(劳动参与率高低),因而降低劳动参与率无助于降低失业率。

参考文献:

1. 蔡 王美艳(2004):《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2. 姚先国、谭岚(2005):《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3. 郭继强(2005):《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4. 金剑(2004):《中国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2期。
5. 林原、林玳玳(2007):《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第1期。
6. 丁仁船、王大D(2007):《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究竟有多高?》,《市场与人口分析》,第6期。
7. 国家统计局(1979~2006):《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8. 国家统计局(1983~2006):《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责任编辑:朱 犁)

ABSTRACTS**Study on Changes of China Family Households in Recent Years**

Guo Zhigang · 2 ·

This paper clarifies some concepts in family studies and attributed family change to interac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formation patterns. The stem family patterns that steer family splitting may turn out more empty-nest families in near future.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change on the shrinkage of family size was weakening while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enhancing. Moreov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eople living in empty-nest famil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dicating that the degree of family splitting was growing. In addition, the latest data show remarkable increase for pseudo-three-generation households now,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area, reflecting quite large amount of old people and children left at home after the prime labors migrated into cities. The paper also briefly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floating on family split and fusion.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Labor Supply in China's Cities

Ding Renchuan · 11 ·

Since China initiated its practice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diminished quickly in citi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at macroscopic economic level, the paper makes use of time series data containing information on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macro economy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temporal and lagged labor supply, by employing factor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vector auto-regression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crease of labor supply are main determinants of the reduction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Regional Change in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Effects of Labor-land Ratio, Off-far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Labor Compensation**

Lu Wencong Mei Yan Li Yuanlong · 20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gional change and its causes in production of rice, wheat and corn since 1978 by using spatial error model and panel data of 1978-2006 from all Chinese provin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regional correlation in Chinese grain production. A production increase in a province can induce an output decline in its neighbours. Besides natural and technical factor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an-land rel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labour payme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which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the production of rice and wheat. With growing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nd concentrated in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areas with relatively rich arable land per capita, few opportunities for non-farming employment and lower labour remuneration.

The Effects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n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Li Wenxing Xu Changsheng · 29 ·

Using time series data and cointegration regression method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n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of 1952-2004.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both in the long run and in the short run. Thes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decline in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decline in the ratio of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real GDP in China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same is also true for the short run. Now that the decline in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approaching the bottom of its trend, it will only have a limited impact on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the near future.

China'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Level, 1992 to 2006

Song Shiyun Li Chengling · 38 ·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leve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judg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ince 1992, follow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the expenditure on the social security has also been growing steadily. However, compared with countries with social insurance patterns, China's social security level is low; compared with the need of domestic social security,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is not appropriate. The limited social security supply cannot meet the growth of social security need. Un-